

蒙元时期的头饰

苏日娜

(中央民族大学 期刊社, 北京 100081)

〔摘要〕 蒙元时期的头饰在材质、形制、种类以及装饰诸方面, 均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展现出集草原游牧文化、中原农业文化与中亚文化相交融的多元文化特质。蒙元时期蒙古人承继东胡系民族的髡发习俗, 男子皆行髡发, 留“婆焦”发式; 男子“冬帽而夏笠”, 喜用珠玉和宝石装饰笠帽, 并以珠玉宝石的多少来判断主人的社会地位。蒙元时期蒙古妇女喜戴一种高耸的“罟罟”冠。蒙元时期的头饰折射出多种文化相交融的绚丽色彩。

〔关键词〕 蒙元时期; 头饰; 发式; 帽饰; 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 K2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08) 04-0068-07

头饰, 是人类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一个民族外部形象的显著标志。同时, 头饰也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 在错综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各民族的头饰, 一方面要顺乎自然承继先人遗俗, 表现出本民族的文化特征; 另一方面, 由于受到外部文化的影响与冲击, 不可避免地产生变异, 因而表现出历史发展的时代特征。

蒙元时代是一个文化交流与冲突强烈的朝代, 其服饰文化呈现出与其他朝代不同的面貌。蒙元帝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 形成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一个高潮期, 契丹、女真、党项等民族悄然融入到蒙古族、汉族和周边其他民族之中。而随着几次大规模的西征, 生活在中亚地区的各民族大量东迁, 经由河西走廊陆续进入中原。在如此辽阔的疆域土地上, 形成几十个民族杂处混居在一起的格局, 这些民族拥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语言文字, 不同民族有各自不同的着装特点和审美观念; 而蒙元帝国又通过四通八达的驿站, 以及伸向南海、印度洋的远洋航线,

打通了亚、欧、非三大洲之间的联系交通, 使许多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生活习俗的民族, 从此有了频繁的往来和广泛的交流。在如此巨大的文化差异的背景下, 各民族通过商业活动、互通婚姻、部族迁徙等活动, 相互之间进行着文化适应, 各自吸收着异质的文化因子, 形成各民族文化大交汇、大融合的空前局面。蒙元服饰在这种多元文化的影响下, 其头饰无论在材质、形制、种类以及装饰诸方面, 均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展现出集草原游牧文化、中原农业文化与中亚文化相交融的多元文化特质。关于蒙元时期的服饰笔者已有拙文专门论述。本文主要采用史料记载与考古资料相比较的研究方法, 从发式和帽饰两个方面对蒙元时期的头饰进行论述。

一、发式

发式是头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代蒙古人的发型经历了一个历史变化过程, 唐代蒙兀室

〔收稿日期〕 2008-02-20

〔作者简介〕 苏日娜 (1959-), 女 (蒙古族),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 中央民族大学期刊社副研究员,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民俗学专业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少数民族民俗文化、蒙古学文献研究。

〔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蒙元服饰与东西方文化交融》(项目批准号 05JA850009) 研究成果之一。

见拙文《蒙元时期蒙古人的袍服》, 载《内蒙古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第29-35页。

韦是室韦诸部之一,《魏书》、《北史》的《室韦传》说室韦“丈夫索发”,《隋书》、《旧唐书》的《室韦传》说室韦“丈夫皆披发”、“披发左衽”。可知索发、披发大致相同,都是留长发后披,不作髻,不编辫,长到一定程度用绳索在发端扎系。从北魏到五代后期的400余年间,见于史乘的室韦人均均为披发。^[1]蒙古族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发式自然不会一成不变,虽有细微变化,但保留有一个基本的游牧民族文化特征,即髡发。

髡,《辞海》解释为“古代一种剃去头发的刑法”。髡发就是剃发。按照中原人的传统,肌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轻易毁弃。因此,蓄发便成了至少是周秦以来华夏系统民族的传统礼俗。蓄发的形式大致有两种,一是编成发辫,盘于头上;二是挽在一起,束成发髻。男子成年,还要加冠。周以礼制治天下,所谓“恶人之无礼,非人也”。违礼和不知礼而受处罚者,要低人一等,不以常人看待。犯罪者,自然也就是违礼者,所以要被髡掉头发,罚作苦役,沦为奴隶。《楚辞·涉江》:“接舆髡首”,楚隐士接舆,佯狂不仕,故而髡首。王注曰:“髡,剃也”。

与中原礼俗不同,蒙古族所从出的东胡系民族的髡发习俗则源远流长,有与华夏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内涵。学术界现有的研究表明,东胡系在商周、春秋、战国之际的文化遗存是夏家店上层文化。在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中发现的人物造型,几乎全部是秃顶的髡发形象。这方面的文化遗产,如1958年在宁城南山根夏家店上层文化东区石椁墓中出土了一把曲刃匕首式青铜短剑,剑柄为一对背靠背的裸体男女,头顶光秃。又,1963年在宁城南山根M102号石椁墓中出土了一块刻纹骨板,上面刻有一个执弓射鹿的男子形象,头顶圆秃。^[2]由此可以证明,古代北方东胡民族的髡发习俗与中原的传统礼俗有着根本的区别。东胡民族行髡发,是为了轻便、实用,这与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生产有关,而不是来源于中原的髡发刑徒。

关于东胡系民族髡发习俗,《史记索隐·匈奴》载:“服虔云: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东,故曰东胡。按:《续汉书》曰: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以为号,俗随水草,居无常处。桓以之号,乌号为姓。父子男女

悉髡头为轻便也。”《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传》说乌桓:“父子男女相对距蹲。以髡头为轻便。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著句决,饰以金碧,尤中国有‘鬘步摇’。李贤注:“鬘,字或为帼,妇人首饰也……”《释名》云皇后首饰上有垂珠,步则摇之。步摇是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的妇女插戴的一种头饰,因其使用黄金制成,形制似树枝,并在树枝顶端装饰有下垂的金叶片和珠子,随人步子的挪动而珠玉摇摆,故名曰“步摇”。南朝诗人沈满愿的一首《咏步摇花》“珠华萦翡翠,宝叶间金琼。剪荷步似制,为花如自生。低枝拂绣领,微步动瑶瑛。但令云髻插,蛾眉本易成”。栩栩如生地描绘出了妇人戴步摇的丰姿媚态。

从以上史料中可以了解到乌桓社会的男女老幼都行髡发,妇女在结婚前才养起头发,分挽发髻,戴上一种称为“句决”的帽子,并饰以黄金碧玉,形同中原的步摇冠。乌桓男子的髡发式样,在和林格尔汉护乌桓校尉墓壁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形式,具体样子是剃去头部四周毛发,只保留颅顶部分毛发,并编成小辫子。与乌桓同源的东部鲜卑也行髡发。《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传》:“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唯婚姻先髡头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宴毕,然后配合。”《三国志》卷30《鲜卑传》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鲜卑亦东胡之余也,别保鲜卑山,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丸同。其地东接辽水,西当西城,常以季春大会,作乐水上,嫁女娶妇,髡头饮宴。”《魏书》卷103《宇文莫槐传》:“人皆剪发而留其顶上,以为首饰,长过数寸则截短之。”宇文鲜卑的发式,显然与乌桓有着很大程度的一致性,这和与乌桓同出一源,其言语习俗颇相类同有关。和林格尔汉护乌桓校尉墓壁画中鲜卑人的形象是穿赭色衣服、留着剃去除头顶以外的全部头发的髡发式样,和乌桓的发式一样,均为髡发,但二者存有区别。^[3]

契丹人是南支鲜卑后裔,其社会习俗应是直接继承鲜卑人的社会习俗,那么发式无疑应为髡发。《宋史》卷264《宋琪传》:“渤海首领大舍利高模翰步骑万余人,并髡发左衽,窃为契丹之饰。”沈括在《熙宁使虏图抄》中说契丹人:“其人剪发,妥其两髦”。“妥其两髦”是指剪去或剃

去颅顶发和颅后发，只留下部分颅侧发，或编成发辫，或自然成绺，垂于耳侧。这种发式，是辽金元之际契丹男子最为普遍而长期流行的基本发式。契丹人胡璩的《卓歇图》和金人张瑄的《文姬归汉图》中所绘人物，皆为髡发契丹人，20世纪30年代被发现的辽庆陵壁画，以及各地被大量发现的其他辽墓壁画资料，足以证明契丹人行“受其两髦”发型，即髡发。其具体发式有七种之多。

蒙元时期，蒙古人承继东胡系民族的髡发习俗。男子皆行髡发。南宋李志常在其《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曰：“男子结发垂两耳。”^[4]南宋使者彭大雅、徐霆的《黑鞑事略》曰：“被发而椎髻。”^[5]南宋使者赵珙的《蒙鞑备录》曰：“上自成吉思汗，下及国人，皆剃婆焦，如中国小儿留三搭头，在凶门者稍长则皆之，在两旁总小角垂于肩上。”^[6]李志常所谓“结发垂两耳”和赵珙所说“婆焦”究竟是什么样的发式？

蒙古汗国时期出使蒙古的西方方济各会修士对蒙古人的发式做了详细的描述。约翰·普兰诺·加宾尼(John of Plano Carpini)在他的游记中有详细记载：“在头顶上，他们象教士一样把头发剃光，剃出一块光秃秃的圆顶。作为一条通常的规则，他们全都从一个耳朵到另一个耳朵把头发剃去三指宽，而这样剃去的地方就同上述光秃圆顶连接起来。在前额上面，他们也都同样把头发剃去二指宽，但是，在这剃去二指宽的地方和光秃圆顶之间的头发，他们就允许它生长，直至长到他们的眉毛那里；由于他们从前额两边剪去的头发较多，而在前额中央剪去的头发较少，他们就使得中央的头发较长；其余的头发，他们允许它生长，象妇女那样；他们把它编成辫子，每个耳朵后面各一条。”^{[7](P.7)}另一位西方传教士威廉·鲁不鲁乞(William of Rubruck)也在他的游记中做如下记述：“男人们在头顶上把头发剃光一方块，并从这个方块前面的左右两角继续往下剃，经过头部两侧，直至鬓角。他们也把两侧鬓角和颈后的头发剃光，此外，并把前额直至前额骨顶部的头发剃光，在前额骨那里，留一簇头发，下垂直至眉毛。头部两侧和后面，他们留着头发，把这些头发在头的周围编成辫子，下垂至耳。”^{[7](P.119)}

元人郑所南《心史·大义略叙》也有记载：“鞑主剃三搭辫发……三搭者，环剃去顶上一弯

头发，留当前发，皆短散垂，却折两旁发，垂绾两髻，悬加左右肩衣袄上，曰‘不狼儿’，言左右垂髻，碍于回视，不能狼顾。或合辫为一，直拖垂衣背。男子俱带耳坠。”^[8]郑麟趾《高丽史》卷28中记载：“蒙古之俗，剃顶至额，方其形，留发其中，谓之怯仇儿。”“怯仇儿”(keköl)，即蒙古语 kököl，《蒙古秘史》56节作“客古里颜”，ke üiyen，译作“琉璃”，节译作“那妇人名诃额仑，哭着说，我的丈夫头发不曾被风吹，肚腹不曾忍饿”。^[9]由此可理解为额前发及左右发髻之总称。

另据清人吴铎辑《净发须知》下卷转引《大元新话》记载元代各式发辫有：“按大元体例，世图故变，别有数名。还有一答头、二答头、三答头、一字额、大开门、花钵椒、大圆额、小圆额、银锭、打索绾角、打辫绾角儿、三川钵浪、七川钵浪、川著练槌儿。还那个打头，那个打底；花钵椒打头，七川钵浪打底；大开门打头，三川钵浪打底；小圆额打头，打索绾角儿打底；银锭样儿打头，打辫儿打底；一字额打头，练槌儿打底。”^{[10](P.445)}记载中很多都是当时理发行业的行话，不容易具体明白。但钵椒就是上述“婆焦”、钵浪即“不狼儿”异译，打辫儿则是上面所说的“合辫为一”。

以上的中外史料对蒙元时期蒙古人的发式都有不同记载，再利用蒙元时期的一些壁画、绘画、石像、石俑进行比较，可以有直观的认识。不难看出蒙元时期蒙古人男子的发式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大类：一为“髡顶垂辫髻”，二为“髡顶合辫儿”。

“髡顶垂辫髻”即当时的“婆焦”式。“婆焦”式又细分为两种：一种是环剃去顶上一弯头发，留当前发，剪短散垂于额前，把其他留下的头发分左右编成小辫子折成髻垂在两肩上，垂髻辫子的数目不等，有二条、三条或更多。《元太祖成吉思汗像》^[11]即为此发式。元太祖成吉思汗戴外白内黑的貂皮暖帽，着浅米色的毛绒衫，留“婆焦”发式，环顶剃去一弯头发，留额前发，余发分左右编小辫折成髻垂两肩。另一种是环剃去顶上一弯头发，不留当前发，把其他留下的头发分左右编成小辫子折成髻垂在两肩上，垂髻辫子的数目不等。《元世祖忽必烈像》^[11]即留此种发式。元世祖忽必烈头戴“后带帔貂皮暖帽”，

留“婆焦”发式，环顶剃去一弯头发，余发分左右编小辫折成髻垂两肩。



图1 《事林广记》插图人物发式

“髻顶合辮儿”即“合辮为一”式。也细分作两种：一种是环剃去顶上一弯头发，留当前发，剪短散垂于额前，并留两鬓角发，把其他头发拢在脑后合编成一条辮子，垂在后背。见图1《事林广记》插图人物，即留此发式。^[12]另一种是环剃去顶上一弯头发，留当前发，剪短散垂于额前，把其他头发拢在脑后盘成髻，《陕西宝鸡元墓》中出土的武士俑，即留此发式。^[13]

蒙元时期，因蒙古贵族妇女喜戴罽毼冠，其发式应该是长发椎髻。但据威廉·鲁不鲁乞（William of Rubruck）记载：“在结婚以后，妇女就把自头顶当中至前额的头发剃光。”^{[7](P.119)}也就是说蒙古妇女也有髡发的习惯。另外故宫博物院藏的元女俑，其发式同蒙古人男子的“婆焦”式。但是在其他史料中再没有见到有关蒙古妇女髡头的记载，其他出土文物和元墓壁画及波斯彩绘中出现的蒙古妇女均未见髡发的例子。所以，蒙古妇女的发式究竟有无髡发，需做进一步探讨。

元代妇女的椎髻发式一般有：“包髻”、“双髻”、“双垂髻”等。“包髻”式，是将头发梳向后脑顶部盘髻，并插簪或扎带。《元宫词》中有：“包髻团衫别样妆”句，^[14]似应为包髻式。“双髻”式，是将头发梳向头顶分左右作两髻。“双垂髻”式，是将头发分左右垂双髻，上面饰有彩带等。陶宗仪有《聂碧窗诗》诗咏：“双柳垂髻别样梳，醉来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见，争卷珠帘看固姑。”^[15]从蒙元时期的壁画中可以清晰地勾画出当时人们的发式情况。在内蒙古赤峰元宝山元墓壁画^[16]对坐图中，女墓主的发式即

“盘髻插簪，耳垂翠环”，“女仆梳双丫髻，髻上扎红带”。内蒙古赤峰三眼井元代壁画2号墓壁画保存完整，以主题画《宴饮图》^[17]中人物服饰为代表，男女主人，平坐宴饮，男主人居左，头戴尖顶宽沿帽，上饰朱红帽缨，脑后垂巾……女主人居右，身着宽袖袍罩开襟长衫，领沿饰花，中单盘领。两侍女头上笼髻，上饰红花，身着盘领长衫。

二、帽冠

帽冠是头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修饰头部，古代概称“首服”或“头衣”。《释名·释首饰》曰：“冠，贯也，所以贯韬敛发也。”古代人蓄发、戴冠，主要用于韬敛头发。“冠”，是古代人头上帽冠的总称，用以表示官职、身份或礼仪之用。蒙古人善骑射、放牧与狩猎，戴帽伊始，初为御寒、防风沙之用，进而，随着社会的繁荣，经济文化的昌达，帽冠便有其特殊的含义，从帽冠上可显现出尊卑贵贱之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蒙元时期不论男女，均有顶冠戴帽的习俗。蒙古人男子“冬帽而夏笠”。冬季戴暖帽，夏季戴笠帽。“暖帽”是一种用珍贵皮毛制成的暖额帽。一般以贵重皮毛制成，也有以金锦制成的。“暖帽”有多种式样，多采用黑貂、青鼠等贵重皮毛制成。冬季多戴之。^[5]“官民皆带帽子，其檐或圆，或前圆后方，或楼子，盖兜鍪之遗制也”。^[18]《万历野获编》载：“元时除朝会后，王公贵人俱戴大帽，视其顶之花样为等威，尝见九龙而一龙正面者，则元主所自御也。”^{[10](P.359)}蒙元时期蒙古王公大臣都戴大帽，即钹笠。“钹笠”，是一种圆檐斗笠形帽，因为形状像钹，所以叫钹笠，也可以叫做笠帽。见图2。笠帽有宽前檐帽、带缨钹笠和后面加轭钹笠，据说宽前檐帽是在忽必烈时期由察比皇后改进而成。《元史·世祖昭睿顺皇后传》载：“旧制帽无前檐，帝因射，日色炫目，以语后，后因益前檐，帝大喜，遂命为式。”^[19]又曰：“国人皆效之。”有《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出土实物。^{[10](P.368)}正好与史相证。内蒙古赤峰元宝山元墓壁画中男墓主人头戴尖顶宽沿帽、饰红帽缨……一男仆头戴圆顶宽沿帽、后沿垂带、形似匙头外分张垂二带。一男仆戴宽沿帽笠，是元代的一大特征。



图2 《安西榆林窟壁画》中行香蒙古人的帽子

采用珠玉宝石装饰笠帽，是元代的又一特征。尤其是官宦人家“诸石之器，莫贵于玉”。从笠帽上装饰珠玉宝石的多少来判断主人的社会地位。当时用于装饰笠帽的宝石多达数十种，红宝石统称为“刺子”，红色宝石共有4种，淡红色的称“刺”、深红色的称“避者达”、黑红色的称“昔刺泥”、红黄黑三种杂色的称“苦木兰”。绿宝石分为三等，上等暗深绿色的称“助把避”、中等明绿色的称“助木刺”、下等浅绿色的称“撒木泥”。又有宝石“鸦鹘”，共计有七种，上等深青色的为“青亚姑”、中等浅青色的为“你兰”、下等浑青色的为“屋扑你兰”，另外是上有白水的“红亚姑”、带石无光的“马思良底”和“黄亚姑”、“白亚姑”等。猫儿眼石也分“猫眼”、“走水石”两种。松绿石又叫“甸子”，按地区来分，回回甸子名叫“你舍卜的”，来自河西的称为“乞里马泥”，来自襄阳变色的叫“荆州石”。^{[15](P.85)}从宝石的起名上看，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西域地区、中原地区和西夏。陶宗仪《辍耕录》卷七“回回石头”：“成宗大德年间本土巨商中卖红刺石一块于官，重一两三钱，估直中统钞十四万锭，用嵌帽顶上。自后累朝皇帝相承，凡正旦及天寿节大朝贺时则服之。”^{[15](P.27)}足以见当时笠帽装饰之华丽、珠宝之贵重。

除上述两种形制外，还有其他几种形制在蒙元时期也颇为流行。“四方瓦楞帽”，在安西榆林

窟壁画和事林广记中均见到该形制的帽子。元代对这种笠帽未有名称，唯有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五色介冑，跨马之士或小帽……或漆皮如庠，而笼中者……”按庠斗即舟中用以漂水的器具，其形底小而口敞，也是类似此笠式。这种象庠斗式的笠帽，近年在山西大同市元代冯道真、王青墓有实物出土，^{[10](P.361)}用细藤和牛马尾或细藤和草作成。另外，还有一种“珠子卷云冠”，多见于西方史料波斯彩绘图中，《成吉思汗和他的内宫》人物所戴帽式便是。^[20]以上几种帽子的形制都是元代常见的帽式。

另外，“暖帽”、“钹笠”与贵族“质孙”服配套，分冬夏两季。冬季有五种，即金锦暖帽、七宝重顶冠、红金达子暖帽、白金达子暖帽、银鼠暖帽。夏季有十三种，即宝顶金凤钹笠、珠子卷云冠、珠缘边钹笠、白藤宝贝帽、大红金凤顶笠、绿金凤顶笠、蓝金凤顶笠、银褐金凤顶笠、枣褐金凤顶笠、金凤顶笠、金凤顶漆纱冠、黄牙忽宝贝珠子带后檐帽、七宝漆纱带后檐帽。^[21]“怯薛歹”是蒙古大汗的护卫人员，享有特殊的政治待遇和优厚的经济待遇。忽必烈建“大元”之后，承袭汉族的衣冠制度，护卫人员的衣饰有了定制，据《元史·舆服制》记载，宫廷护卫人员在头饰方面所使用的巾、冠多达13种之多。

蒙元时期，蒙古妇女喜戴一种高耸的冠饰，名为“罟罟”。罟罟在史料中又被写成“故故”、“姑姑”、“固姑”、“罟罟”、“故姑”或称作“李黑塔”。罟罟冠是一种蒙古人特有的有地位的已婚妇女所戴的冠帽。见图3。罟罟冠的取材随地域的不同而有差异。往往是以生活中最容易得到的材料制成，早期在北方以树木、桦树皮为骨架，继而以铁丝制架，进入中原以后则以竹为骨架。罟罟冠的装饰也随贫富不同而有差异，富者饰以宝石、珍珠、彩珠、翠花、琥珀、织锦、孔雀羽毛等；贫者则只能以青毡、黑布、粗麻、野鸡毛等来装饰。最早的罟罟冠较高，包括顶上饰

(1) 交角幘头，交折其角于巾后。(2) 凤翅幘头，形制类似唐巾，两角上曲作云头、两旁覆以两金凤翅。(3) 学士帽，形制类似唐巾，两角如匙头下垂。(4) 唐巾，¹角，两角上曲作云头。(5) 控褐幘头，形制同于交角幘头，金缕额。(6) 花角幘头，形制同于交角幘头，两角及额上簇象生杂花。(7) 平巾幘，用黑漆革制成，形制如进贤冠之笼巾。(8) 绀罗抹额，上绣宝花。(9) 五色幘巾，上画宝相花。(10) 锦帽，用漆纱制成，后幅两旁前拱而高，后画连线锦，前额作聚文。(11) 武弁，用皮革制成。(12) 甲骑冠，用皮革制成，加黑漆，雌黄为缘。(13) 金兜幘，用皮革制成，金涂五色，与衣甲同色。

物平均在 3 尺左右,元末降到平均 2 尺左右。通过罽罽冠的高矮变化可以反映蒙元社会经济的繁荣与衰落。罽罽冠的形制大体上基本相同,不过依地域的不同略有差别,主要表现在取材和装饰风格上。并且直接受社会经济的影响,当社会昌达、经济繁荣时罽罽冠的装饰则华美富丽,帽冠高耸。



图 3 戴罽罽冠的皇后
(南熏殿旧藏《历代帝后像》局部)

蒙元初期服饰无定制,加之受各民族文化的影 响,服饰多“靡丽相尚,尊卑混淆”,到元代关于衣饰制定有许多禁令,穿戴超出了规定范围要受重罚。皇帝帽子的式样,严禁民间仿造。《元典章》中就有许多记载,一个工匠为皇帝做了顶新式样帽子,大德元年(1297 年)皇帝利用监司官承直传话:“呈上位新样黑羔细花儿斜皮帽子一个,进献上位看过。钦奉圣旨,今后这皮帽子休做与人者,与人呵,你死也!”大德十

一年又作出规定:“金翅雕样皮帽顶儿,今后休教做,休交诸人带者。做的人,根底要罪过者。带者的人,根底夺了,要罪过者!”^[22]

元代对民间装饰品有严格限制,一般百姓的帽笠上不可以用金、玉装饰,妇女首饰只准许用翠花和金钗各一件,耳环可用金珠碧甸,其他首饰只能用银制成。^[15]因而,金、银、珠、玉、翠等饰品成为身份等级的象征。元代民间一般多戴幞头,有唐巾、抹额等样式。女子也有戴头巾的习惯。称为包髻。

朝廷命妇首饰有严格定制,一至三品命妇可以穿浑金花衣服,元代妇女讲究头饰,一般有首饰和头面,首饰包括钗、钏、耳环、梳等,头面主要包括钏、镯等,根据质地不同分为玉头面、金头面和银头面等。

蒙元王朝的建立以及空前的对外交往,使东西方各民族的文化相互交融。表现在服饰上,不仅是汉人与蒙古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其他民族的服饰习俗也对蒙古人、汉人服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大批从西域俘虏来的织金绮工匠迁徙弘州等地进行手工造作,在服饰的材质方面,繁密的图案、艳丽的色彩等无不显现出中亚文化之元素;在服饰的纹样装饰方面,则糅进了中原传统文化的丰富寓意。而在舆服制度方面又先后承袭了汉族的儒学衣冠传统。元朝末年还有“宫衣新尚高丽样,方领过腰半臂裁”。^[23]可见高丽服饰也曾风靡一时。同样,蒙元时期的头饰折射出多种文化相交融的绚丽色彩。

〔参考文献〕

- 〔1〕张久和、傅宁.东胡系各族发式考辨[J].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5):71.
- 〔2〕田广林.契丹髡发礼俗述略[J].文物,1998,(4):38.
- 〔3〕盖山林.和林格尔汉墓壁画[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94.
- 〔4〕〔南宋〕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Z].王国维遗书[C].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1983.
- 〔5〕〔南宋〕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Z].王国维遗书[C].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1983.
- 〔6〕〔南宋〕赵珙.蒙鞑备录[Z].王国维遗书[C].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1983.
- 〔7〕〔英〕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 〔8〕〔元〕郑所南.郑思肖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81—182.
- 〔9〕额尔登泰、乌云达莱.蒙古秘史<校勘本>[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929.
- 〔10〕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上海:上海书局出版社,1997.

详见拙文《罽罽冠形制考》,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第103-107页。

- [11] 元朝历代帝后图像 [Z]. 北京蒙文书社, 1924.
- [12] [南宋] 陈元靓. 事林广记 [M]. 元至顺刻本, 1962, 中华书局影印.
- [13] 刘宝爱、张德文. 陕西宝鸡元墓 [J]. 文物, 1992, (2): 28.
- [14] [元] 朱有墩. 元宫词 [M]. 借月山房汇钞本.
- [15] [元] 陶宗仪. 辍耕录 [M]. 卷八.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85, 86.
- [16] 项春松. 内蒙古赤峰元宝山元代壁画墓 [J]. 文物, 1983, (4): 40.
- [17] 项春松、王建国. 内蒙古昭盟赤峰三眼井元代壁画墓 [J]. 文物, 1982, (1): 54.
- [18] [明] 叶子奇. 草木子 [Z]. 卷3下, 杂制篇.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19] 元史 [M]. 卷114, 后妃传一.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20] [德] 阿尔涅 埃格布莱希特 (Arne Eggebrecht) 主编. 蒙古人及其世界帝国 [M]. 插图, 德国美茵茨市: 菲利浦·冯·查伯恩 (Philipp Von Zabern) 出版社, 1989, 44.
- [21] 元史 [M]. 卷78, 舆服志一 冕服.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22] 元典章 [M]. 卷58, 工部一 造作 杂造. 黄时鉴点校本.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
- [23] 张昱. 宫中词. 张光弼诗集 [Z]. 四部丛刊续编本.

Headwear in Yuan Dynasty

Surna

(Journal of 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Headwear in Yuan Dynasty had reached a very high level in material, shape design, variety and the decoration and presented the multi-cultural feature of combining the culture of grassland stock raising, the culture of the central land and that of the east Asia. In hair style, Mongolian people in Yuan era inherited the Donghu habit and tied their hair on the heads to form a "pojiao" style for the men. They would wear hats in the winter while in summer, they would wear large bamboo hat. The hats they wore were decorated with jewelry and diamond. People would judge the social rank by seeing the number of the jewelry and diamond they had on their hats. For Mongolian women, they would wear a "gugu" hat, a kind of high hat. The headwear in Yuan dynasty reflected the rich color of multi-cultures.

[Key words] Yuan dynasty; headwear; cultural communication; hair style; decoration on the hat

书讯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概论》出版

该书由崔箭、唐丽主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编写秉承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收集和整理了大量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学资料, 发现各少数民族医药学的发展水平有一定差异, 有的民族内容丰富, 有大量的文献和系统的理论体系, 有的民族仅靠口授或代代相传。本书的编写也汇集了大量社会调查、实践经验和各家论述等方面的内容, 在此基础上, 系统地按民族特点展现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学原貌, 对我国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学的理论体系、诊治原则和方法、常用药物和方剂等方面的资料和内容进行了科学分类、整理和论述, 是一部全面介绍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学概况的书籍, 具有良好的科学性和启发性, 具有较高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本书的编撰使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零散纷杂的理论、经验和方法统一到具有民族性和科学性的现代体系中来, 丰富了祖国医药学宝库。